

德城文史



德 城 文 史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德州市德城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2000年11月

目 录

岁月回眸

说“九死一生”

——往事回忆片断…………… 华应民 (1)

德县飞机场的建立及其焚毁…………… 贾士君 (40)

女裁缝与泰山“千年和平钟”…………… 张闽文 (44)

春秋随笔

千里寻根到洪洞…………… 刘金忠 (49)

“最难得者是民情”

——康熙、乾隆咏德州的诗章… 刘金忠 (70)

古迹寻踪

德州水馆驿…………… 孙寿昌 (77)

德州藏书家、藏书室、楼名号考

…………… 王永顺 梁国楹 (83)

德州四合院…………… 孙寿昌 (92)

文史纵横

明清时期德州田·卢·李·谢氏家族

..... 田贵宝 (99)

德州匪首史存善 贾士君 (191)

德州南关基督教堂钟楼十字架油漆纪实

..... 孙寿昌 (198)

艺海春秋

高少亭传略 陈洪岭 (207)

旧德州民间艺人表演见闻 孙寿昌 (211)

史海勾沉

羿·后羿与德州 田贵宝 (225)

羿·嫦娥·后羿 刘金忠 (242)

羿和后羿 张洪波 (247)

顾炎武济南蒙难德州诸名士营救记

..... 孙寿昌 (264)

大顺军在德州被逐简述 孙寿昌 (275)

私塾的管理与教学 华应民 (283)

晚清时期的科举概况 华应民 (290)

抗战时期的德县教育工作概况 华应民 (295)

补 白

古代甄选人才故事	(39)
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48)
富有科学趣味的对联	(82)
孔圣人后裔的行辈	(91)
趣味“左右”	(98)
“天安门”是谁设计的	(190)
“花翎”探趣	(197)
秋天的雅称	(206)
包公论冗吏	(223)
第一张人民币	(224)
光阴何以称“寸”	(241)
“千金”原指男子	(274)
梁启超慧眼识俊才	(282)
古代的“劝学诗”	(305)

说“九死一生”

——往事回忆片断

华应民

战火纷飞的年代，常提到“九死一生”这个词。世界如果能持久和平，祖国能长期国泰民安，这个词就有可能逐步淡漠或者消失了。这或者是一种愿望，也或者是一种事实。

其实，现在活着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多是在“九死一生”中走过来的。当然，所走的路并不完全一样。

由于想到这个词儿，使我联想到我这一辈子究竟有多少次死里逃生？

“洛口遇险”

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济南大、中学校被迫停课放学。时在济南华北中学就读的我，只得携同齐河县的本校同学李业正同行，逃回

原籍。李业正长我三岁，原籍宴城镇，我原籍德县，我们俩可结伴过黄河同行至桑梓店，然后分手。当时黄河洛口大桥已轰炸中断，日寇用木船连接搭成浮桥，做渡河之用。浮桥两端驻有日军，来往路人必须经此盘查。凡在此渡河者，日寇必先挥拳打行人两个耳先，然后搜身检查，有时还进行种种侮辱。

我与李业正剃成光头，穿破旧短衣，装扮成小商贩模样。走至浮桥南端，见前面有 20 余人在等待检查过河。远处见到日本鬼子兵检查一个穿长衫戴草帽者，似搜出一个类票夹的东西，当场即将此人击毙。另外，见有的被检查殴打后放过河去，有的被留下，在河边排队等待。当时，我们已无法回避逃跑，只得硬着头皮走向检查路口。

日本兵数人荷枪实弹气势汹汹，一日本翻译询问住址、职业等情况，我们答以为卷烟商贩，并熟练地回答居住地址。在检查李业正的提包时，一个日本兵拿走他的一个手电筒，也可能就是这个手电筒救了我一命。检查我的包裹时，由于我疏忽，将一张“防空演习讲义”忘夹在一本破旧的小说书中，引起了日本兵对我的怀疑，对我拳打脚踢，再三追问，我只答以旧书是从书摊买的，其他事不知道。这时日本兵将我拉到不让过河的排队人中间，当时计有六男一女七个

人，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鬼子兵放走经盘查过河的一些人后，叽咕了一大阵，就把被留下的七个人押至涛涛黄河岸边，枪响处前边的几个人倒在了血泊中。这时李业正跑到曾拿走他手电筒的鬼子兵面前，一再说明我们“商贩”身份和年龄，这个日本兵又同一个类似小头头的鬼子叽咕之句，最后，击毙了五人，留下了那个妇女和我。

一小时后，大概是为请示对我如何处理，两个鬼子兵押解我到洛口镇一座大房子里，里两坐着一个鬼子官，先听了鬼子兵的一段话，然后用阴森狡诈的目光看了我一阵，又拿着那张防空演习讲义看，特别注目讲义中缝间，这事后使我想到这张讲义的中缝间写着“民国二十五年印”，这就说明讲义已是过时的了。鬼子官看了一阵，一句话也没给我说，只给鬼子兵叽咕两句，就叫我“开路”了。

我同李业正两人又回到了黄河渡口，过河后带着满腔耻辱、仇恨和庆幸未被枪杀的情绪，走到桑梓店车站。我们两人在一片荒郊原野流着惜别的泪水，攥着复仇的拳头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就这样分手了。

此后，在两三年的书信来往和消息传递中，知道李业正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任游击队区队长时，在

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光荣牺牲。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仍记忆难忘，李业正的音容笑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绘图”

1938年冬，在一个寒风怒吼、大雪纷飞的深夜，日寇 1415 部队的一个中队进驻了边临镇。从此，这一片家乡土地，便进入了烧杀抢掠、腥风血雨的年代。

1938 年至 1941 年，这几年的冬天，我动员、组织家乡青年弟兄，举办了“农民夜校”。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学文化。由于都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时常遭受凌辱，所以仇恨日寇的情绪很高。这几年参加夜校的青年弟兄做了许多隐蔽地抗日工作。

1940 年 4 月，德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当时，抗日政府的力量，确像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星星之火”，但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很快就有了燎原之势。

县政府、八、九区政府成立后，有关同志逐步和我有了接触和联系。我家和边临镇近在咫尺，于是就成了抗日政府侦察敌情的前沿阵地。

1941 年冬，日寇的炮楼据点遍及各地，边临镇、土桥、惠王、王槐庵、大道孙、神头……，星罗棋

布。同时，我抗日力量也不断壮大，在德县由东向西逐步扩大我抗日根据地，在游击区、边缘区及敌占区，我们的活动也不断增强。

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县政府文教干部崔据东，通讯班刘应涛来我家说：“县长指示，我们要掌握各日伪据点的军事布署情况，将他们据点里面的布局和周围环境搞清楚，然后绘个地形图，这个任务叫我寻机完成。”

数天后，边临镇西街鬼子据点要将据点周围的所有民房拆除，意在防备对其隐蔽攻击。当时由汉奸警备队下令，要附近各村派民夫去扒房干活。这时我认为视察敌情的好机会，就随同本村民工到了鬼子据点。

这个据点是占用了西街刘宪增的一所院落，中间修建了一个约高 30 米的炮楼，大门向北，架有西层铁丝网，门东设有一个半圆形碉堡，院内有北房、西房，有较宽阔的场地，最南边是伙房和厕所，四周是加固的高墙，并有铁丝网。如果据点周围的民房拆除之后，确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由于我村民夫到的早些，被分配到据点院内西边，拆扒一部分土房，时间不长，炮楼内外的拆房民夫都到了，监工敌人的吆喝声、被拆户群众的哭叫

声，乌烟瘴气，尘土飞扬，一片狼籍惨象。

这次行动，由于失误，导致了一次生死线上的惨祸。中午时分，鬼子、汉奸都去吃午饭，子活的民工也都掏出怀里揣的饼干、窝窝蹲在北墙根啃着，这时我走进南边的厕所，蹲在一个角落的厕坑上，从口袋掏出一块一寸长的铅笔头和一片香烟纸，意在记一记所见到的有关情况，刚写了几十个字，突然厕所木门被踢开，进来一个鬼子兵，我急忙将铅笔头丢进厕坑，将纸片放在了嘴里，当时可能因神色有些慌张，引起了这个鬼子的怀疑。他抓起我的胸襟，看了厕坑中并没有粪便，便面目狰狞地问我：“你什么的干活”？由于我口中的纸片尚未软化咽下，所以未能误话。这时他对我拳打脚踢之后，把我带到院子里，叫一名粗通日本话的“拨役”问我。这个人姓刘，是边镇北街人，原来盘乡卖煤油，鬼子来后，他没靠日寇，当了“拨役”，侍奉日本人，助纣为虐，横行乡里。他一再威胁我说通八路；他拿着木棍，那个鬼子拿着皮带，把我打得鼻口流血，遍体鳞伤。一顿毒打之后，把我拉到一个黑屋子里锁起来。

后来知道，本村出夫子活的乡亲，都到“拨役”刘某那里说情，证明我是老实农民，不通八路，但他置之不理，丝毫不为所动。边临镇解放后，据说此人

逃亡东北，下落不明。

鬼子把我捆绑双手，锁在一间黑屋里，这屋的一角铺有一堆碎草，阴湿黑暗，在草堆里却蜷卧着一个小孩，看样子也不过五、六岁，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但又似乎未死。我想，这么点小孩犯什么“罪”，为何抓铺到鬼子据点呢？

事后才知道，据说河北吴桥的鬼子在“讨伐”时，抓捕一名抗日县长未能抓到，将县长的儿子捕未，鬼子调防行军时，将孩子留放在这里。

约近午夜，数九寒天飘着零星雪花，有七、八个鬼子提着两盏马灯，绑着我并拖着那个小孩子，走到离鬼子提点西边不远的捆武庙，这座庙已是颓墙残垣，地上倒着一块石碑，鬼子把我绑在一根柱子上，把孩子放在石碑上，然后由鬼子伙房的一名中国伙夫拉来一车井水，放在石碑旁，几名鬼子狞笑着撕掉孩子身上的衣服，向他身上一盆盆地浇凉水，只见在浇第一盆水时，孩子似乎抖动了一下，以后再没有动弹，就这样把孩子冰冻在石碑上。鬼子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残杀这个无辜的孩子？是报复？是取乐？还是法西斯魔鬼本性？

鬼子一面向孩子身上浇凉水，一西给我说：“你的实话的不说，和小孩子一样，死了死了的”！

正在这寒风刺骨、鬼火闪烁的时候，看到一名日本翻译和汉奸维持会长走近几名鬼子中间，叽咕了几句，鬼子又把我带回到黑屋子里。

后来知道，是本村村长、“首事”，连同乡里群众及我舅父等人请客送礼、转托边临镇士绅，贿赂维持会长、日本翻译，我才得以“取保释放”。

后来也听说冰冻死在庙里石碑上的孩子，第二天尸体“不翼而飞”，原来是日寇伙房的伙夫韩某（边临镇西街人），连夜将孩子尸体转运到其家乡。

抗日怒火更加熊熊燃烧。

“破路”

1942年，日寇疯狂地对我抗日军民围剿屠杀，推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自德州县城通往边临镇、徽王庄、吴桥、陵县等地的土公路上，汽车、铁甲车时常往返。这时，我们也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挖掘地洞，村村连接交返沟，夜间破坏敌人行走的土公路。

3月份的一个晚上，天下着蒙蒙细雨，一片漆黑，八区副区长魏华南告诉我，今晚组织三华乡十几个村的群众“破路”，从边临镇以北到大道孙据点以南这一段，是敌伪据点边缘地带，要将外小心。因我是当地人，地

形熟悉，所以由我和侦察员老乔同志负责督导检查。各村群众有村干带领，指挥部设在申家湾，有事由老乔出面与各村联系，我尽量不暴露身份。

由于这个地段在敌伪三个据点（边镇、徽王、孙庄）之间，属边缘区，且社会人事关系较为复杂，组织群众破路又是兴师动众之举，所以，尽管由县、区武装做了些封锁和防范工作，但仍被敌人侦知，并遭到突然袭击，没能达到破路的目的。

午夜时分，各破路段刚进行不到一小时，突然边临镇北门外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我们所设的监视岗哨，见到敌人出动，匆忙鸣枪报警。敌人从北门和东门分两路包剿而来，各段破路群众听到枪声后，很快逃避转移，煞时间都踪影全无。老乔同志说他去申家湾指挥部报信，要我向而逃避，这时已隐约看到了敌人手电筒的光亮。我飞跑到马升衢庄，刚进庄来头，不料大遭孙炮楼的敌人也同时出动，许多敌兵已进了庄西头，达时我背腹受敌，无路可走，就转弯跑到当时的村长马吉林家。

马吉林是穷苦人，自幼随吴桥县的一些私业杂技团体“玩戏法”、“耍猴”、“要把戏”，成年后，常年合伙耍杂技、跑江湖，为人很讲义气，但家景贫寒。日寇占领本地后，马升衢几家地主唆使支持他当了村

长，意在使他应付当时的复杂局面，为他们服务。我们抗日区政府对他的家庭和为人了解后，进行了一些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马吉林成了一位“白皮红心”、“敌我两面政权”的边缘区村长。

我叫开马吉林的门后，这时边镇、大道孙两个据点的敌人都进了村，狼嚎鬼叫，鸡飞狗跳，一片混乱。

马吉林匆忙地把我藏在影壁墙后竖着一些玉米秸的角落里，这时敌人已在砸门，几个敌人进院后，其中有两个伪军认识马吉林，问有没有跑来八路和挖道的民工，马吉林回说没有，他们又到屋里查看一阵，在院子里乱转。这时有一个鬼子兵端着刺刀朝向我藏躲的玉米秸堆刺了两刀，当时我感觉左腿部划动了一下，但屏住气一动未动。马吉林见状，忙给那两个伪军说：“我带你们到各家着，有没有八路”。敌人走出大门，马吉林把门反锁上，也跟着他们走了。

大约在村里折腾了将近一小时，忽听见南面枪声又起，敌人弄不清情况，匆忙集合，抢了些包袱和几头牛、驴，回他们的据点去了。

枪响的原因是侦察员老乔将敌情报给指挥部后，区、县干部、战士几十人即由申家湾转向陈李庄、史家阡到边镇南门外的侯庄，朝南门炮楼打了几十枪，然后转移到九区地带来了。

敌人走后，我从柴堆里出来，马吉林也从村里回来，这时我才感觉左腿有些疼痛，裤子内部也湿了一片，到屋里点上油灯，才看到大腿出血，原来是鬼子向柴堆捅刺刀时，差一点没捅着我，大概是在抽回刺刀时，刀尖划破了肉皮，血流不止。所幸马吉林多年干马戏团，保存的有点刀伤药，吉林与吉林嫂两人给我敷上药，包扎一下，因伤势不重，马上就能走路了。吉林嫂给我擦拭棉裤上的血迹时，见到棉裤被敌人的刺刀穿透一个洞，如再稍偏一点就捅在我的左腹部。吉林嫂说：“你真是福大命大，差一点就见了阎王爷”！

自此，我与马吉林成了生死患难之交。建国后，我虽调到夏津、聊城等地工作，也从未间断通信来往。1964年吉林兄患严重胃溃疡病，我陪他在人民医院动了胃大部切除手术，由于他一生摸爬滚打，而且穷困潦倒，所以身患多种疾病，于1965年去世。两年后，吉林嫂亦与世长辞。

“抗高”

1942年是日寇侵华烧杀抢掠最嚣张的一年，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其地面部队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对我根据地、游击区进行围剿堵截；天上也时有飞机侦察、扫射和轰炸，鲁北大地一时腥风血雨，乌云滚

滚。

敌人也进行所谓的政治攻势，宣传“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并推行保甲制度，在敌占区发放“良民证”，组织联防自卫团等等，企图用种种手段扼杀抗日力量。但这些“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伎俩，在中国人的眼里不攻自破。

6月下旬，县政府派大教干部郭德元和崔振东来说，目前“青纱帐”已起，有利于我们的穿插回旋游击活动，上级考虑建立一个“抗日游击高小”，一方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一方面做为动员青年参军参政的桥梁组织，籍以补充和扩大我们的抗日力量。“抗高”跟县大队活动，主要是学习文化和进行抗日爱国主义教育。

两天后，通知我到了八区所属的五槽碾马庄，当时校长由周至刚担任，赵青祥、孙子和和我算是教员。几天后，由县、区政府推荐挑选了十几名青年干部，又在各乡、村动员了数十名青年农民，总计二十七名学员，就算“抗高开学”了。

开始几天跟随县、区武装部队活动，一天转移一个地方，中间也曾随杨忠的二营辗转于德县八、九区。住到一个村庄后，除给群众进行些宣传，帮助群众干些农活外，就是在大庙里或树林里上课学文化，